

空间社会学视域下城乡空间关系演进研究

宗海勇

(南通大学 发展规划处,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城乡关系表现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形态和社会关系。工业革命以来以资本为中心、忽略主体价值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凸显。我国城乡关系在城乡二元体系弊端下,主要表现为城乡生态生活空间的不协调、经济市场空间的不平等、文化教育空间不一致、福利保障空间的不均衡等。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应当在保持城市乡村独立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通过实现农业人口城市化,实现城乡地理空间的融合、发展方式的融合、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融合、空间正义的融合。

关键词:城乡排斥;城乡融合;城乡二元体制;空间社会学;空间正义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8)06-0109-07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革。2006年国家出台农村税费政策改革新举措——废止农业税,2008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1][7]},同年全国各地推广“农民集中居住区”改革试点。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是中国社会重大的历史性转折^[2]。另一个数据是,当中国城镇化率在2015年达到56.1%时,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达到37.1%的新低。^①此外,新型农村合作社蓬勃发展,村民自治如火如荼,种种迹象表明,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经济文化发展、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逐渐与城市接近,城乡关系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本文尝试将城乡关系置于空间社会学视域中加以考察,力图揭示城乡关系从对立走

向融合的动力机制和深刻影响。

一、城乡关系:空间社会学的范式转换

城乡关系是城市的必然产物,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经济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关系的集中反映。早期的城市空间研究起始于空间的非社会性,如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都侧重于从理论和模型的变量计算中关注城市发展。随着芝加哥学派对城市发展和伴生问题的关注,城乡关系才开始成为空间社会学研究的主题。

“人们普遍同意,空间和时间是社会构造物。”^{[3][9]}空间的社会化趋势是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

① 中国产业信息网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609/445170.html>.

收稿日期:2018-03-12

作者简介:宗海勇(1980-),男,江苏如皋人,南通大学发展规划处副研究员,博士。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2018SJA1222);南通大学人文社科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必然结果。社会活动即空间，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本体性存在。社会空间即意义空间，社会关系构成社会空间的核心内容，而城市社会主导的城乡关系则是社会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对城乡关系的空间社会学研究，旨在突破传统工业化现代化形成的城乡相排斥的局限，通过超现代性的方式实现城乡融合，走向空间正义和社会价值的归属。

1. 空间的实践性

马克思从空间是人类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出发，强调空间为人类提供生活保障和自然前提，而人类则通过生产生活实践不断改造自然空间，最终形成在空间中的对事物的认知与实践。空间成为人类理性给予“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的场所，成为具有强烈社会蕴含的客观存在。城市作为空间的典型代表，历史性承载了生产实践等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城乡关系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城镇化的逻辑起点”^{[4][18]}。马克思以城乡空间变迁审视人类社会历史，以“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重点阐述了大工业生产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城市的推动与空前发展。马克思从劳动的社会化特征，对人的本质规定和力量作出概括，“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意志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5][24]}，是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丰富与扩大，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质和量上不断提升的进程，是人类不断诠释着空间的社会属性和历史属性的进程。

2. 空间的社会性

在造城立市、肆意扩张的城市化运动中，社会问题频出，城市化弊端日益显现。20世纪60年代，以亨利·列斐伏尔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无限制城市化进程进行集中批判，并系统论述空间生产的本质、特征，空间的社会性和社会学的空间分析转向逐步凸显。列斐伏尔通过研究“空间即社会的产物”，将社会空间理论和空间社会学推至历史舞台。在其核心主张“时间—空间—社会”三元辩证法中，空间是开放、丰富的社会关系的载体与容器，空间具有鲜明的以社会关系为特征的社会性“性格”。“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

方式的变化就必定伴随着一个新空间的产生”^{[6][46]}。列斐伏尔将空间性从“时间——历史”维度解放，将空间理解为人类社会关系重组的社会秩序进程。大卫·哈维继续强调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第二自然”，坚持以城市空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点，将城市空间作为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的爆发场域，揭示空间不平等、冲突的资本内涵，并着力探寻构建“合目的性”的公平正义的城市空间样态。爱德华·苏贾旨在建构“社会—空间辩证法”即以空间性——空间的社会属性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空间性是传达空间的社会关系，空间(组织)是由此产生于社会而反作用于社会关系的存在。“空间是一种语境假定物，而以社会为基础的空间性，是社会组织和生产人造的空间”^{[7][1]}。苏贾强调对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对空间的组织、开发、占有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地理学与空间平衡维度来理解和建构空间。

3. 空间的人本性

强调空间的人本性是对空间社会性深入研究的结果。城乡空间关系的人本主义批判视角，更直观展现了关注“人”及其意义、价值实现的核心主题。人本主义批判路径以大写的“人”及其主体性为中心，分析“人—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将人及其所处的环境作为中心，强调人在空间中的主体能动性，寻找人类在地方、日常生活中体验，理解并发现被文化、意识、背景等因素所影响和限定的价值与意义。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家，从地方、身体、日常生活体验等角度，揭示人类存在的根源、生活核心意义、世界的统一性和可知性的基础，开辟了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围绕地方、价值、意义的人文主义批判思潮。段义孚把空间、地方等地理要素纳入社会关系形成过程之中，指出人类的本质生活产生于意识、价值和情感与空间的社会交互作用之下。特定意义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代表着相应的价值、意义和归属，是人的本质属性。齐美尔等社会学家从心理、社会等层面研究空间关系对人与人关系的影响，空间社会学开始逐步进入研究视野。

4. 空间的历史性

空间社会学视阈中的城乡关系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

首先,城市乡村化阶段是“自然成长起来的”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城市发展依赖于农村广袤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农村是维系城市的母体,城市发展呈现农村化的特点。早期乡土中国对城乡一体、自然和谐的社会状态的倡导,即为城市乡村化的中国实践。其次,乡村城市化阶段,是指在近代以来开启的资本城镇化进程中,以农业和工业的分离、劳动力与土地的分离为基础并由此形成的城乡分离与对立。费孝通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开始抛离乡土社会”^{[8]16}。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发展从属于国家工业化战略,通过以农业服务于城市工业,形成了城乡二元体系,是乡村城市化的中国式表达。最后,城乡一体化阶段,也就是空间社会学研究范式转换下的目标阶段。科学把握农村的价值,是新型城乡关系的根本。农村绝不仅仅是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生产空间与环境等的工业附庸,而是具有文化环境保护、庞大人口支撑和社会政局稳定的价值,等等。早期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作为前提与铺垫,在完整、成熟的工业化生产体系建立后,形成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关系基本格局,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城乡关系上对我们的启示。

二、城乡空间排斥:空间不平等的社会意涵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的十九大对城乡关系排斥和不平衡发展结果的最直接表述。城市是生产力集中表现的最佳形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见证与汇集。“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9]2}。相比之下,农村空间则简单自然、偏僻边缘、落后单调,成为城市光环下的阴暗角落和直接附庸。

1.生态生活空间不平等

随着资本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肆虐,城市空间对农村空间持续挤压侵蚀。资本城市泯灭了文化多样性、异质性,漠视自然和生态系统、遗忘生活功能,成为简单枯燥生产模式和丧失日常生活意义的躯壳存在。纵观中国农村问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早期,通过“剪刀差”方式和农民捐赋,形成对城市社会的高度积累。改革开放以后,二元化

工业模式对农业的剥夺进一步加剧,突出表现为城市空间对农村土地资源与空间的侵占。近年来,城市空间“摊大饼”式蔓延扩张,农村空间则进一步荒凉化、空心化、边缘化。而且,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进程。据统计,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000年的22439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40058平方公里,再到2015年的52102平方公里,城市面积平均每年增长近6%;形成对比的是,农村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始终在160000千公顷的国家红线附近徘徊。与此同时,从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城镇人口近50%的2010年算起,城镇人口由66978万人(占比49.95%),增加到2015年的77116万人(占比56.10%),年均增长仅为1.2%左右。^①由此可见,城市化并没有真正形成人的城市化,而只是片面将乡村空间和乡村劳动力简单吸纳成为城市发展的资源要素。城市空间对乡村空间的快速压缩性发展,还导致环境资源日趋逼近其能够承载经济社会发展的极限。

2.经济市场空间不平等

经济市场空间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市场要素资源的不平等,主要包括劳动资源和建成环境资源等。建成环境主要是指人类实践活动形成的人造环境,是指调节空间矛盾与冲突,让不同阶层共享城市发展红利,回归成果空间正义的意义关联攸关方。第一,劳动力资源由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首要原因。血缘和地域关系是农村社会的主要特点,广大农民以土地和简单劳动维持生产生活。城市则以发达的生产力、持续较高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农村劳动力。第二,城乡土地资源的不平等直接表现为城市对农耕土地的不断侵蚀。土地资源、自然空间作为生产、居住、仓储、交通等功能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21世纪初,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由农民负担转变为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的问题,土地征用大量占用优质耕地也威胁着全国的耕地保有量和粮食安全”^{[10]66-83}。第三,建成环境的不平等主要是指农村作为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劳动要素提供者,相比于城市作为资

^①《中国统计年鉴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ch.htm>.

金、信息、技术等市场发展优势的非劳动要素提供者,资本盈利能力和报酬率会远远落后于城市。由于我国在 1949 年后城市工业化进程的迫切需要,资金、社会资源等市场要素在政府的行政指令下不断向城市聚集,农村单纯成为城市化、工业化的重要市场要素输送来源。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发展差距。

3. 文化教育空间不平等

城乡经济市场空间不平等深刻影响着城乡居民文化教育水平,也由此导致城乡科教文卫的政策空间泾渭分明、深层次矛盾凸显。长期以来,农村文化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底子薄,后劲差,农村文化教育的师资配备和投入不足。这主要是因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文化教育管理与投入体制是“分级管理、以乡为主”,直接导致文化教育发展所急需的政策、资金、人才等资源,重点偏倚扶持城镇学校,农村优秀教育人才流失严重,文化教育空间急剧萎缩,直接形成文化教育资源“乡村缺”的基本格局。随着 2006 年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行,配之以一系列经费保障和教师绩效工资改革等,这一状况得以逐步改善。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文化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由“乡村缺”转为“乡村弱”——教育资源数量不足转为质量不高,而同时城镇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由“城镇多”变为“城镇挤”。城乡矛盾的改变也直接影响着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空间布局的重大变化。随着乡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规模庞大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逐渐提高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广大农民对优质文化教育资源的诉求也更加强烈,于是形成城乡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局面,乡村逐渐形成向城市教育移民的又一单向流动潮。

4. 福利保障空间不平等

城乡社会福利结构存在倒挂现象。一方面,城市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相对健全。以企事业单位职工为例,城镇单位福利保障大致包括四类:首先,城市建立了社会保险、救济补贴等职业福利制度;第二,方便生产生活的职工宿舍、职工食堂、幼托所等集体福利设施;第三是活跃文化精神生活的

图书馆、体育馆等文体福利设施;第四是过节礼、慰问金之类的节假日福利。另一方面,农村作为亟待提高政策照顾、福利保障的落后区域,却因为发展滞后反而被福利保障制度遗忘,以至于成为社会保障的盲区,福利水平严重滞后。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开始探索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福利保障制度,真正意义且延续至今的只有农村合作医疗。1956 年,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是在自发创建集体合作医疗站的简单阶段水平。到 1965 年底,山西、江苏等多地的部分市县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然而,这一制度的推行再遇阻碍,由于集体经济基础衰微、制度缺位和政策失衡,到 1986 年时,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占比由 1976 年的 90% 锐减至近 5%,直到 2008 年才得以全国范围继续推广。命运多舛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城乡福利保障空间严重不平等的缩影,也折射出我国城乡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历史性和艰巨性。

三、城乡二元:空间失衡的突出症候

城乡关系最终发展成为城乡二元结构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产物。马克思一语道破资本空间与其他空间矛盾、城乡空间分裂失衡的根本原因:资本逻辑下社会资源由农村向城市集聚,乡村社会关系断裂碎片化为城市化发展的附庸,社会矛盾集中于城市,空间对立与矛盾压力逐步加大的情况下,城市进一步向农村索取社会资源、转嫁社会压力。而资本空间拜物教时刻将空间资本化的冲动,更是直接催生城乡社会空间和主体的分裂对抗。经济、社会空间和主体的排斥,演变为文化礼俗习惯之间的对立,以至于滕尼斯直言,城乡空间排斥对立就是礼俗社会与法制社会之间的矛盾对立。

城乡二元结构典型存在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过渡的发展中国家,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农业国家和农村主要是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社会,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主要特点,农业产业附加值和效益的增长速度较低,产业扩张能力较差,从事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靠天吃饭、看天收成,劳动付出多而收入回报少;另一方面,方兴未艾的城市是资本主导下现代化大工业机器生产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发达的分工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关系

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确保城市工业的低工资、低资源价格和高额的工业利润，集中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城乡之间关系的变化实际上是城乡结构对重工业优先战略的一种适应”^{[11][12]}。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间简单原始的本质差异，在资本化复杂社会分工的洪流冲击下，愈发固化原本对立冲突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自身还存在巨大的空间排斥内涵，中国空间资源的国有属性决定着其生产与分配由国家和集体统一配置，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城乡空间排斥的二元分割格局。空间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性加剧，村里人与城里人的身份区隔泾渭分明。首先，“城市土地国有制、农村土地集体制”这一城乡有别的土地制度，决定着城市土地转让直接以市场为导向，国家以较低价格标准进行收购和对农民赔偿，但是农民很少真正能够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第二，城乡空间的社会规划无视农村的内在规律、发展特征，以城统乡、促乡辅城的规划逻辑泛滥，农村居住空间布局无序、产业发展空间混乱、耕地空间保护不力。第三，城乡劳动力就业二元格局影响至今，城乡劳动力政策等二元分区，严重限制了劳动力的空间自由流通，市场资源配置导向被无限扭曲。尤其是户籍制度，长期遏制着劳动效率和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第四，长期的社会历史原因，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政策保障与投入高度偏倚城市，这也导致城乡社会的发展差异明显、空间界限分明，城市全面主导农村，农村直接服务城市。客观来讲，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赶超现代化进程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国民经济建设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储备和安全政治环境，但是，建立在工农产品剪刀差、土地双轨制等巨大城乡失衡基础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破坏着农民的自我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别等城市化必需元素，成为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必须坚决打破的桎梏。质言之，空间资源的市场化原则必然导致空间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形成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均。不同于空间的社会化本质原则，市场化分配以价值为尺度、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唯有摒弃空间资源的单一市场化原则，回归空间的社会化本质，才能彻

底摈弃业已惯性化的城乡二元格局。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超过50%以后，区域社会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开始向城乡融合即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12][13]}。狭义来看，当前需要破解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三层含义：首先是存在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即城乡二元体制。其次是存在着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和聚居方式。最后是存在着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方式。这其中，城乡二元体制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对立的直接产物。“城镇化本质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全方位的变革，影响极其深刻和广泛。”^[13]通过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从而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能够实现对经济增长潜力的释放，促进城乡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空间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配置效率，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和社会公平正义。

四、城乡融合：空间正义的实践路径

中国城市化初期，建立在剥夺农村劳动力基础上的人口红利是城市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力；城市化深入发展形成的土地红利，则是资本逻辑主宰下城市空间异化对社会空间抑制和粗暴发展；更高层次的城乡融合，则应当是充分发挥制度红利，以人为本。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系统地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进度安排。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促进城乡融合，实现空间正义。

第一，城乡融合必须以人为本为价值旨归。工业城市时期，城乡对立是自由资本主义无视人的主体性价值的表现形式。当前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不可避免地也是资本为动力引领的空间生产的进程。但是，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直接产生对空间资源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空间资源的市场化原则遵循以价值为尺度，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背离了空间资源满足社会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需求这一本质规定。明确以人为本原则，核心在于要打破以城乡户籍为核心的城乡二元制度，

重点在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早期通过城乡户籍制等片面追求均等化的制度安排，然而，这一制度已经远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城镇化六大任务之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第二，城乡融合应当积极扬弃资本逻辑。马克思指出，自然空间在人类实践下人化为社会空间，空间的社会属性逐步形成空间生产的决定力量，成为空间社会学的核心理念与指向。马克思·韦伯则通过关注空间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服从于占有的资本逻辑，资本创新的本能驱动也必然处于与现实生产方式存在的矛盾之中。作为资本集聚地的城市，为了谋求最大限度的生产与消费，必然造成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消耗破坏，资本城市发展模式也必然遭遇自然和历史的界限。只有马克思所理解的对资本的限制和否定，才能形成对资本的扬弃路径。需要指出的是，对资本逻辑的扬弃是一种并非全盘否认的部分否定，即正确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和推动城乡空间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限制、引导、驾驭资本，对其片面性进行批判和遏制，进而实现对空间生产的调控。应当摒弃当前资本、商品对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彻底占据，实现城市空间生产的多元化发展和日常生活回归。通过回归使用价值，扭转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异化。通过积极建立空间与人的联系，回归服务于人、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

第三，城乡融合必须实现经济市场等发展方式的融合。城市逐渐成为社会中心和文明制高点。城市生产社会化还改变着传统农耕生产方式，使得农村天然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形式，被工业生产转化为资本链条上的共同体。“工业革命过程中产生了众多的革新活动，它们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一部分农

民变成为剩余劳动者，于是这部分人开始向城市的工业和商业企业转移。”^{[14][26]}对农民的改造成为可能，“大工业在农村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因此，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15][469]}。城乡融合是生产力和城市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城市发展达到特定阶段，农业问题、农村农业现代化开始以工业化为前提，并在城市工业现代化推动下为社会转型发展奠定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趋同还会产生城乡空间地理环境的融合。“在资本和国家的指令下，城乡间曾经存在的清晰划分会逐步消退，成为一种地理发展不均衡的相互渗透空间。”^{[16][20]}这种清晰划分的消退，是与生产力发展、时空压缩、汽车时代、高速公路和郊区模式等密切关联的。当“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创造力，产生了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城市环境”^{[17][462]}之时，逃离主城区和熟悉郊区化生活，变成时髦的生活消遣方式。而失地农民被淹没于“被城市化”的洪流，迫于生计流向高密度、高拥堵的城市中心，由此产生的城乡双向流动也间接促进了城乡融合步伐的加快。

第四，城乡融合是空间正义实现路径的融合。工业城市时期，基于克服时空限制和降低通勤成本、提高资本增值效率等基本考量，生产物资交换便利的中心城市迅速发展。当空间被逐渐拓殖为资本创新增值的手段，由此形成的后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社会，成为城市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时代境遇。此时，知识更新、技术革新导致时空压缩并消解城市向心力，形成“没有城市的文明”，空间地理位置更多表达着政治与身份诉求，而成为城市空间正义的基本内涵。卡斯特尔直言流动性空间属性时指出，“流动空间已经成为我们社会支配性权力与功能的空间展现”^{[18][466]}。当“信息化开启了权力与不平等的一个新范式”^{[19][28]}之时，没有边界的开放空间成为权力统治和流通的界限。空间正义在流动空间中由于对话与交流这样的社会交往形式，而变得更具可感性和可实现性。由于流动空间中参与主体的多变性、开放性和广泛性，社会空间主体的参与权、言论权、知情权得以扩大，对政治权力再分配的监督也就愈发有力，路径更为

清晰。尼葛洛庞蒂断言，“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20][32]}。城乡社会的普遍发展，资本力量的积极推动，流动空间组织的进一步自由开放，消弱了传统政治秩序和权力不平等支配，空间正义随着城乡社会一体化融合的客观进程而普遍获得，以地方空间为基础的民族国家的专制权力也被弱化。由此可见，城乡普遍流动空间的实现加快实现了权力配置与权利获得的平等。

参考文献：

- [1] 张春龙.中国乡村巨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2] 倪方钰,段进军.基于区域视角下对江苏城镇化模式创新的思考[J].南通大学学报,2012(5).
- [3] [美]大卫·哈维.空间和时间的社会建构[M]//薛毅.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三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4] 武廷海,张能,等.空间共享：新马克思主义与新型城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法]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7] [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8]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9]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M].王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10] 周飞舟.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1).
- [11] 叶涯剑.现代化战略与中国城乡隔离的关系探析[J].老区建设,2015(2).
- [12] 新玉言.国外城镇化——比较研究与经验启示[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3.
- [13] 陈祖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 [14] [美]阿瑟·奥莎利文.城市经济学[M].周京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6] [美]大卫·哈维.叛逆的城市[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17]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 [18] 孙逊,杨剑龙.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 [19] [英]斯各特·拉什.信息批判[M].杨德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20] [加]文森特·莫期可,黄典林.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顾理辉

The Evolution of Urban Ru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ZONG Hai-yong

(Office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presents human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material culture form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entering on capital and neglecting the value of the main body has highlighted the problem of un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the drawbacks of the dualistic system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isharmony of the urban and rural ecological living space, the inequality of the economic market space,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pace, the disequilibrium of the welfare security space, etc..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the process of rural modernization should be accelerated on the basis of maintaining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geographical space, of development mode and of social welfare and profit guarantee system, as well as that of space justice, should be realized.

Key words: urban and rural exclusion;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dualistic systems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pital; spatial sociology; space justice